

中国共产党在“角色转换”中 必须保持革命本色

陈学明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市 200433)

摘 要:当今中国共产党确实需要“角色转换”,但在“角色转换”中必须保持自己的革命本色,就是说,不能离开党的最高纲领来谈党的角色转换;不能把建设与革命截然分开;不能在西方政党理论视野中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不能在消极的意义上来理解“革命”。苏共丧失革命精神导致亡党亡国的反面教材告诉我们,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千万不能褪去革命本色,把自己的党当作“建设党”、“全民党”。由此来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从严治党,全方位地维护党的革命本色: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维护其基本纲领的革命性;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不断纯洁自己的革命队伍;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人民性来强化革命性;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党的革命本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角色转换;革命本色;执政党;革命党;建设党;人民性;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5/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4-0029-15

前几年,中国学术界曾就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和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现在尽管这一讨论的热度已经降了下来,但实际上在学术界,甚至在政界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获得比较一致和清晰的想法。这场讨论起初只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自觉和执政理念的探讨,后来则涉及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品格和性质要不要转变的问题。这一问题事关重大,如果当今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将直接影响到当今中国还需要不需要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以及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一、中国共产党确实需要“角色转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学术界,掀起了这场关于如何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的热烈讨论,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离开了这一背景,根本无法认清这场讨论的意义和本质。

(一)中共领导人在夺取全面夺取政权前夕就开始考虑“角色转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政权前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就已经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其角色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搏杀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实现自己的角色转换、承担起自己新的历史使命。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是一次实现党的历史地位和工作重心的变化的准备会。毛泽东在会上是这样表述业将完成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和即将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之间

的关系的：“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1]1438}他还指出，面临新的历史任务和考验，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党只要努力学习和善于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1]1439}。

事实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前后，中共中央有一系列举措都是为适应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即实现角色转换的需要服务的。例如，1948年7月，中共中央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让党的干部在思想上适应新的历史使命。刘少奇对第一班学员作报告说，现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了，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管理新中国，问题更复杂了，事情更艰难了，全党要“更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2]。还如，194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在该通知中毛泽东要求全党从现在起开始为“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1]1347}做准备。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自己的角色的转换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他们的讲话中开始把自己的党称为“执政党”。例如，周恩来在1954年处理高饶事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就率先使用了“执政党”这一概念，他说：“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3]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他还强调“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新的考验”^[4]。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但是明确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5]“执政党”概念的明确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承认自己的任务的变化，而且已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

总之，我们回顾五六十年代的这一段历史，必须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取得了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确实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都在努力实现自己的角色转变。中国共产党若没有这种角色转变，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地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恢复国民经济，就不可能从1953年开始就实施“一五计划”的建设并取得巨大的成就，就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任务。

(二)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取得了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角色转变的意识与党的地位的重大变化还是不相符合的，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角色转变意识的程度显然还跟不上其承担的历史使命变化的程度。所以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在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取得全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其地位和面临的任务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许多人，包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角色转换。这当然可以用当时国际国内的许多客观存在的原因加以解释，但这毕竟是值得吸取的历史教训。

中国共产党对自己角色转变的意识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主要反映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身上。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是最先提出必须实现角色转变的，但是在后来也正是他对这种角色转变持“忌讳”甚至“消极”态度。

毛泽东回避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即回避承认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个执政党，就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他对角色转变持“忌讳”甚至“消极”态度。这里仅举一例说明。^[6]1957年3月10日，他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说：“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7]显然，这里用“我们执政七年”来表述要比“我们解放七年”要顺畅得多，更要符合语法和

逻辑,但毛泽东就是回避“执政”两字。毛泽东回避“执政”两字决不能认为这只是表明他没有注意到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关于“执政党”的提法,而是必须承认毛泽东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表明他是不赞同急于使用“执政党”这一概念的。^[8]实际上,早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即在1956年9月15日上午,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稿,尽管之前他在审阅修改党章报告稿时已基本认同关于“执政党地位”的提法,但此时他却经过认真考虑还是最终把提法定位在“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说明,毛泽东对“执政党”这一概念是刻意回避的。^[8]

当然,是不是用“执政”和“执政党”来称谓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的问题,这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和地位变化的认可和认可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围绕着对这一称谓的争论,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究竟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的争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对角色转换的认识不一致,特别是由于作为领导集体的核心、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对角色转换未做出正确、清晰的表述,从而造成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内难以形成与其承担的新的历史使命相适应的“角色”和“地位”意识。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着角色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的严重错位,即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生了转变,而角色没有相应地转变,所以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中共八大以后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均与此有关。

角色和所承担的任务的严重错位,必然导致将在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体制、观念、领导方式延伸到执政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战争时期一步步形成的那种权力过分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政治体制,在进入执政时期,以建设为主要使命以后,不但继续延伸了下来,而且为了适应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还得以强化。^[6]

而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实现角色转换,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角色和所承担的任务严重错位的一个结果。中国共产党既然已成了执政党,它就应当努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协调各方面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及时消解社会危机,努力使社会全体成员和睦相处。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原来的剥削阶级从整体上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还是千方百计地去寻找新的敌人,这样在不能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的情况下,竟然把人的思想状态作为划分敌我的标准,结果不是化敌为友,而是人为地化友为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角色不是带领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是不断地开展阶级斗争,以至于生产发展缓慢,而“阶级敌人”越斗越多,从而结果是社会动荡,矛盾丛生。

(三)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充满着争议与反复

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角色开始正确定位。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也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实现角色转换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现角色转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明确地把自己的党称为执政党。1979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会议的讲话中首先使用了“执政党”这一概念。紧接着,在党的正式文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公开使用了“执政党”的概念。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出现了“执政党”的概念。之后,自党的十二大开始,“执政党”这一概念就频繁地出现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与之相应,“执政意识”、“执政水平”、“执政能力”、“执政基础”、“执政规律”等一系列概念也相继出现在国内各种报刊杂志上。

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个“执政党”的提法,最著名的是见之于陈云和邓小平的两个论断。陈云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9]陈云的这一论断得到了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赞同陈云强调中国共产党既然成了执政党那么其党风好坏至关重要。邓小平则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0]276}的问题,邓小平在

这里要求用执政党的要求来衡量党和党员。

在充分肯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共对自己的角色转换获得成功定位之后,我们还须指出,这一转换是个长期的过程,决不会一蹴而就。种种事实表明,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之所以出现了如此多的曲折甚至反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实现角色转换,或者说对角色转换的重要性以及角色转换的内涵的认识还不够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学术界、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的大讨论,就具有其必然性。我们必须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整个历史过程来认识这场讨论的实质与意义。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对中共的角色转换的意义,特别是对中共角色转换的内涵的认识充满着争议,这说明,中共的角色转换本身是曲折的,决不会一帆风顺。

二、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决不意味着丢弃“革命”的本色

这场关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问题的大讨论,本来只是涉及对这种转换的重要性与意义的认识,但后来证明这场大讨论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导致经久不衰,关键在于它还延伸到了对究竟转换什么,即转换的内容的探讨。如果说对前者,认识还是比较容易获得一致的话,那么对后者则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本来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而引发这场讨论的,后来则演变为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究竟还是不是“革命党”,即对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革命本色的一场事关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命运的探讨。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的必要性获得比较一致的认识以后,如何认识这种转换的实质与内容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成了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转换的是在社会政治构架中的地位

全部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它的角色所发生的变化。非常清楚,只能把这一变化理解成是其在社会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原先在全国范围内讲,它并不处于执政地位,现在则变成了领导整个国家的执政党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从“非执政的角色”向“执政的角色”的转换。

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非执政的角色”向“执政的角色”的转换,其任务和职责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如果原先主要职责是推翻旧的政治结构,那么它现在的职责主要是维护已有的政权,促进经济繁荣,保障国家安全;如果原先它着眼于夺取政权,那么它现在则着眼于怎样用好这个权;如果原先它以进行社会动员为出发点,那么它现在则以让社会在体制下正常运作为出发点。^[11]

当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革命任务实现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工人阶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会发生历史性的转移,我们应当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二)不能离开党的最高纲领来谈党的角色转换

如果我们如上述那样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只是理解为是党的工作重心和历史任务的变化,那么就不会把这种转型说成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说,把这种转型与丢掉革命本色联系在一起。实现共产主义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是实现这一最高纲领中的重要一步,绝不意味着要抛弃最高纲领,告别革命。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能离开党的最高纲领来谈所谓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既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那么革命就必然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革命的精神与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具有逻辑统一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不仅要否定数千年的私有制,而且要与建立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观念相决裂。共产主义要使人类彻底摆脱人类的动物状态,即动物界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法则,使人类真正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上向无阶级的社会的历史复归。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

告诉我们，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由具有彻底的革命性的阶级来完成，这一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生存处境决定了它具有革命的彻底性的特征。这种革命的彻底性不仅表现在它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见之于它必须不断否定自身，即革自身的命。马克思恩格斯这样说道：“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2]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不但清楚地告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的整个过程必须处于“革命中”，即共产主义必须在“革命中”才能实现，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诉诸革命，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所以，十分清楚，只要中国共产党还是个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丢掉革命的本色和革命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共产党因为角色转换了，处于执政地位了，就告别革命，宣布自己不再是“革命党”了，那么也就等于消解或者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13]中国共产党必须处理好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任务与长远的共产主义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就是坚守自己的基本性质。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根本任务是什么，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如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就可以放弃革命了，这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性质和根本任务。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实现角色的转换，实际上把工作的重心转换到另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上来。这里有一个党的最高纲领和阶段性纲领统一的问题。共产党人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必须为党的当下任务而努力奋斗，但他们明白，在完成当下任务的时候，是在为将来向更高阶段准备条件，是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并最终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如果这样来认识党的最高纲领与阶段性纲领的关系，那就不会在完成某一阶段性任务时，把最高纲领置之脑后，误以为可以丢弃革命精神了。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决不是目的，而是把它作为实现最高纲领的条件和途径。同样，中国共产党从事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也不是目的，而也是把它作为实现最高纲领的必要步骤和前提。中国共产党以夺取政权为基本任务转换为以建设为基本任务，从“非执政的角色”转换为“执政的角色”，只是从实现一个阶段性纲领转换成实现另一个阶段性纲领，而这两个阶段性纲领虽然具有前后的关系，但都从属于最高纲领。这是两个阶段性纲领之间的转换，而绝不是最高纲领与某一个阶段性纲领之间的转换。无论是实现什么样的阶段性纲领，只要这一阶段性纲领与最高纲领联系在一起，都得需要革命精神来支撑和维系。如果没有这种革命精神的存在，如果不保持革命的本色，那么完成阶段性任务就会无所依傍。打碎一个旧世界与建设一个新世界，都是包含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之中的。^[14]总之，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的标尺来给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角色转换加以定位。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充当了执政党的角色，只是表明它在社会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不代表它的政治属性有了什么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以昔日的“革命”历史为“荣”而不是为“耻”，以继续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为“荣”而不是为“耻”。试想一下，倘若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最高纲领，她与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什么区别吗？

（三）不能把建设与革命截然分开

有些人一谈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马上把这种转换说成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换。由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主要任务和职责是从事建设，所以他们有时又把这种转换表述为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换。这里首先必须指出，“执政党”与“革命党”并不是同一系谱的术语，不能把它们并列在一起来描述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关键在于，所谓“执政党”指的是政党在社会政治架构中的地位，而“革命党”则表述的是一个政党的政治属性，“执政党”是个法律概念，而“革命党”是个政治概念，从而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转化关系。^[13]

可能有人会解释说，这里所说的“革命”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仅仅是指用暴力推翻旧的三座大

山,夺取政权的行为。所以这里所说的转换也仅仅是指中国共产党原先主要从事用暴力夺取政权,而现在则转换为主要从事经济建设。当然,如果这样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表述“革命”,那么把夺取政权之前的中国共产党说成是“革命党”,把夺取政权之后的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建设党”,从而相应地把转换说成是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换,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表述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换,也不能只看到“转换”所隐含的两者区别的一面,还应看到“转换”所隐含的两者关联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用暴力夺取政权与从事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工作重心,后一段的工作是建立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是对前一段工作的继承和发展,而绝不是对前一段工作的否定。两者之间不是否定的关系,而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谓“转换”并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

关键在于,有些人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强调从“革命党”向“建设党”的转换,是为了说明从事经济建设不需要原先的那种革命精神了,中国共产党也不需要保持革命党的本色了。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理解成:把革命意识转换为建设意识,又把建设意识转换为“纯技术”的操作意识。所以,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革命”与“建设”的关系的问题,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从事经济建设究竟还需要不需要革命精神的问题。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抓经济建设是所有执政党共同具有的执政行为。它并不反映政党的政治属性。一个执政党搞不好经济建设充其量会失去执政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抓经济建设不重要),可是如果这个党放弃了标志其本质政治属性的社会价值观和以这种价值观为动力的精神追求,那么这个党就会瓦解,连翻本的机会都没有!”^[13]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经济建设,把经济建设作为其中心工作,这本身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向实现最高纲领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有可能导致革命精神的消解。借助于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进行经济建设,实质上就是利用内在逐利机制和分化机制的商品关系,这就有可能导致社会利益配置不公和失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造成在执政团队中形成逐利集团。而所有一切,都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属性,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目标严重相违背的。面对这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致力于经济建设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革命党的本色,严守自己的革命精神,才有可能消除所有这些负面效应,使经济建设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的实现同步。现实表明,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完全的因果关系,要使这两者之间产生因果效应,必须借助于从事经济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继续秉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保持和发扬以党的最高纲领为目标和动力的革命精神。^[13]撇开了革命来谈建设,把建设与革命相割裂,其结果不但否定了中国革命,也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阶段需要有革命精神,在从事经济建设的阶段同样需要有革命精神,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阶段是个“革命党”,而在从事经济建设阶段同样是个“革命党”!只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还没有完成,中国共产党就总是个“革命党”!“革命”与“建设”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革命”与“执政”也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四)不能在西方政党理论视野中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

毛泽东竭力回避“执政党”这一概念,确实有上面我们所指出的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持消极态度的错误。但另外我们还须指出,“执政党”这一概念确实来自西方政党理论。如果笼统地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执政党”,具有把中国共产党混同于资产阶级执政党的可能性。毛泽东谨慎地对待这一概念的使用也事出有因。

在西方政党理论中,“执政党”这一概念并不是一个单体性概念,另外还有一个概念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在野党”。“执政党”与“在野党”这一对概念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反映,其基本特

征就是所谓不同的政党“轮流执政”。中国共产党借用西方政党理论,把自己新的角色称为“执政党”是可以的,但必须明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同日而语,那么就意味着预设了中国也在实行多党制,预设了中国共产党也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实际上以迂回的方式隐喻了多党制的政治前景”^[13]。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西方式的“政党轮换”制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仅仅是一个“暂时处于执政地位而随时有可能把政权交给其他政党”的政党吗?在中国存在着可以与中国共产党相匹配的“在野党”吗?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参政的民主党派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吗?中国也会给与共产党相抗衡的“反对党”、“在野党”合法性吗?我们必须在对待所有这些问题十分清醒和清楚的状态下来谈论中国共产党是个“执政党”,来谈论中国共产党向“执政党”转换的角色变化,否则极有可能陷于某种政治陷阱。正如金安平先生明确地指出的:“‘执政党’作为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概念,它所对应的是‘在野党’和‘反对党’概念,而西方式的政治格局,不仅在中国旧民主革命时期没有形成,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也没有出现。”^[14]

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与资产阶级政党处于“执政地位”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执政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目的,而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获得执政地位不是历史使命的完成,而是新的开端”^[13]。资产阶级政党也曾经具有革命性,但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只是夺取政权的手段,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党一旦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便利用政权为本阶级利益服务,为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效劳,当然其原先的革命性也随之消失。无产阶级政党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它必须继续将革命进行下去,致力于改革开放,从事经济建设,是进行新的革命。从需要进行新的革命这一角度说,中国共产党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执政党,而现实确实也在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执政党。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其深刻用意就是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实现角色转换以后,还在从事革命的事业。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还是与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当今确实是个执政党,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高自己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是顺理成章的,但中国共产党这样做,显然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好地实现阶段性的任务,而不是为了谋取自身的什么特殊利益,更不是放弃了自己的革命本色。

(五)不能在消极的意义上理解“革命”

当然,中国共产党要在执政时期保持自己的革命本色,有个前提就是对“革命”必须做出正确的理解。“革命”这一概念曾经是一个非常令人神往激动人心的概念。多少革命志士正是为了革命参加了革命队伍,为了革命而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革命”在当今中国一些人眼里,竟然成了一个贬义词。他们把革命与破坏、恐怖完全等同在一起,与之相应,把革命者等同于强盗、匪徒、恐怖分子。他们对“革命”竭力加以贬低、攻击、咒骂。

他们对“革命”的仇视,集中表现在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丑化上。对历史上的农民的起义、农民的革命加以丑化不消说,即把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一直到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完全否定不消说,就是对孙中山领导的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甚至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也竭力否定。总而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与“起义”、“革命”沾上边的,他们都看不顺眼。须知,没有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哪里有封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否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为腐烂透顶的清王朝招魂。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直接要中国人民回到处于三座大山重压下的旧中国去。

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色,当然首先得恢复“革命”这一词汇的应有的光环。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瞻望未来,革命永远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但告诉我们,“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也就是说,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革命都会发生,都不会以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转移,而且也向我们揭示出“革命”就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也就是说,人类历

史进步与发展总是离不开革命,任何力量都无法替代它。

革命在打碎旧世界的过程中,当然也会释放出一些负能量,但无疑其主流是释放正能量。正能量永远大于负能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负能量可能多一些,但这终究是暂时的,正能量最后总会占上风。正因为如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唯物论的态度看待革命,千万不能抓住革命的一些负面因素大做文章,进行否定革命的基本面。

革命的形式当然有多种多样,有激进的也有渐进的,有激烈的也有平稳有序的。但无论是持何种形式,其宗旨和目标都是同一的,即都是要改变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因此,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处于激进时期还是处在渐进时期,其宗旨和目标不能变,相应地其革命的本色和革命的精神不能变。靠革命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一旦真正告别了“革命”,其领导中国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

三、吸取苏共丧失革命精神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

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有许多,近因、远因,外因、内因,尽可分析。但无疑,苏共没有正确处置好执政后的角色转换,即“华丽转身”没有转好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不能忘记当年赫鲁晓夫曾经把自己的党称为“工业党”、“农业党”,也就是今天一些人所说的“建设党”,竭力褪去革命本色。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把革命与建设对立起来,要建设不要革命的路线,与后来的亡党亡国之间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苏共丧失革命精神导致亡党亡国,对于当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置“角色转换”,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

(一) 苏共把角色转换变成消解革命意识

应当看到,苏共执政地位稳定以后,特别是在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其作为执政党的意识还是相当强烈的。这可见之于苏共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文本以及苏共权威党史文本对自己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苏共完全体现了一个执政党的意识。凡是现代执政党的一般执政要素,如确立主导意识形态,建立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问题在于,共产党不是一般的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其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其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仅仅秉承一些一般的执政要素还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它仅仅充当一般的执政党角色还是不够的。但是我们看到,苏共在取得政权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用一般的执政党的属性来要求和塑造自身,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执政党。其主要标志就是仅仅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执政党”,而强调不再是一个“革命党”。苏共明显地使角色转换的过程变成了消退革命本色和革命精神的过程。

苏共的这种消退革命本色和革命精神实际上从上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苏共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后就提出:“列宁提出的‘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的胜利解决了”^{[15]496}。“共产党人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实现列宁的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15]720}。这实际上是在宣告:苏共现在开始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革命可以置之脑后了。自此开始,革命的内涵以及革命的对象逐渐在理论视野和政治视野中淡去。^[13]如果说在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苏共的这种消退革命本色和革命精神还是不自觉地进行的话,那么自 50 年代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起,则是完全自觉地推行的,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以至于考察苏共 50 年代以后的文献,几乎找不到“革命”的字眼。

(二) 苏共消解革命意识的种种表现

苏共借处于执政地位实现角色转换为名来消解革命,即把角色转换的过程变成消解革命的过程,是全方位的。这里列举三个方面:

其一,通过提出“全民国家”来放弃与背叛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众所周知,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主要表现为他提出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的观点。理论上的错误导致了他在实践中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人

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如果能够正确地纠正斯大林的错误，那就能使苏联在这一问题上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但显然他并没有这样去做。他以苏共已是一个执政党，苏联已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为名，竟然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他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完全不顾当时苏联存在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贪污盗窃罪犯等客观现实，更完全不顾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不择手段地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的客观现实，公然宣布：“在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和阶层”，“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的危险业已消除，社会主义不仅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正是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依据，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全民国家”的论调。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更是把“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全民国家”理论发展到极致。他把民主与专政完全对立起来，只讲前者不要后者，宣扬要“无条件地实施民主”。面临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发动大规模的“街头政治”甚至以暴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关键时刻，面临国外一心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国外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西化、分化活动的关键时刻，他步步退却，竟然反复强调：“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这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16]40}完全不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全民国家”，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消除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阶级斗争已经不存在了，国家已是一个“全民国家”了，还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再提什么革命？革命在苏联就这样完全失去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其二，通过提出“全民党”来放弃和背叛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属性。

赫鲁晓夫在鼓吹“全民国家”的同时又宣扬“全民党”。1961年10月，由他主持的苏共22大通过的《苏共纲领》和《苏共章程》中公开宣称：“列宁原所建立的，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共产党，走过了光荣的斗争道路，引导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取得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苏联消灭剥削阶级，形成并巩固了苏维埃在社会主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社会主义完全地和最终地胜利了。共产党，工人阶级的党，现在变成了全体苏联人民的党。”^[17]赫鲁晓夫在这里不但提出随着历史时期的变化，苏共必须转换角色，而且他把这种角色转换明确地定位为从无产阶级政党转换为“全民党”。以后的苏共领导，则全盘接受赫鲁晓夫的“全民党”的口号，用“全民党”的口号来褪去革命党的本色。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27大公开宣布“苏联共产党已成为全民的党”^{[18]335-336}。在如何对待共产党性质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他公开宣称要抛弃“与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立场”。1990年召开的由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共中央三月全会通过的《苏共章程草案》删去了关于党的阶级性质的一段话，宣布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的联合体”。1990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苏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党，而是全体人民的党；它代表的不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苏联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戈尔巴乔夫在向大会作的报告中说得更明确：“今天的苏共是一个全民的政治组织”，必须“在民主范围内和中央与地方立法机构范围内争取和保持执政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18]153}我们在这里也可看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些领导人，正是在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名义下，要改变共产党的政治属性，把共产党改造成一个“全民党”、“议会党”。共产党人的革命性和先进性都不见了，把共产党人等同于一般的老百姓。而只要是政党，总是某一特定阶级的代表，“全民党”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和“政党”这两个词不可能联系在一起。把共产党说成是“全民党”，实际上是使共产党违背自己的革命宗旨，将之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宣扬共产党不能只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应当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连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不了，怎么还能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

其三，通过提出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来放弃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开始动摇，也始于赫鲁晓夫。他推崇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企图在

意识形态上也向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开放”，为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涌入苏联“大开绿灯”。而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抛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反对精神垄断”的旗号下，让马克思主义放弃自己的理论阵地，实际上是让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他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围剿”的同时，又竭力把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引进来，并奉为圭臬，称之为“全世界共同的世界观”、“全世界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突出的是，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取代《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为了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专设一个部分，即第三部分，用以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揭露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阶级本性以及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危害，划清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重新用与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的各种“社会主义”没有本质区别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来对抗和取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捍卫的科学社会主义。^{[16]42}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有时也开展所谓“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或者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但这种教育由于是在“纯建设”意识下进行的，所以必然抽掉了共产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革命”。革命是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之所在，这种革命既包括“革”外部旧世界的“命”，也包括“革”自身的“命”，即无产阶级政党“革”自身利益机制的“命”，让无产阶级政党勇于否定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共产主义革命的彻底性就体现于此。抽掉了“革命”的共产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失去了现实感染力。^[13]另外，随着推崇意识形态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必然丧失了。据苏联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教授说，到苏共瓦解前，在1500万党员中，仍然相信马列主义的不超过300万人。^{[18]355}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得以立足的根本，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一个号称是共产党的“党”如果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她还是一个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吗？或者即使她还有共产党的称号，她还是一个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本色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吗？

（三）苏共消解革命意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不否定苏共的领导人早先或许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才致力于消解自身的革命意识，实现从“革命党”向“农业党”、“工业党”，向“全民党”的转换，但最后实际结果是：他们这样做非但没有使自己的执政地位巩固，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

关键在于，苏共消解革命意识必然使自己挖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一根基。无产阶级政党维持革命本色，永葆革命精神，说到底就是为了确保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保持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丧失革命本色和革命精神，就意味着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之间不再相一致，意味着自身已有了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不一致的“特殊利益”，意味着所追求的只是自身的功利。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必然遭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唾弃，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不再认为这个党是自己的了。苏共直至上个世纪70年代，还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的文献中这样写道：“它同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有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9]可实际上，随着它消解革命精神，这种“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已不复存在。请看下述一项问卷社会调查：这项调查发生在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前夕，是由苏联的社会科学院组织实施的。所询问的问题是：“苏共代表谁？”结果是：认为代表工人阶级的只占4%，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集团的占了85%。这充分说明苏共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已经不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代表了。^[20]随着广大人民群众不再认为这个党代表自己的利益，苏共的党员也成批退出了这个党。据苏联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教授说，1990—1991年退出苏共的党员达300万。1986年2月苏共27大时党员人数为1900多万人，到了1991年7月，便减少到1500万人左右。而就是这些尚留存在苏共内的党员，实际上早已离心离德。所以，1991年8月24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自行解散时，这些党员没有抗议，没有示威，表现出惊人的冷漠。^[20]我们知道，苏共在拥有20万党员时取得了“二月革命”的胜利，在拥有35万党员时取得了“十月革命”

的胜利,在拥有 550 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而在拥有近 2 000 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执政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取得执政地位以后消解了革命精神,背离了革命本色,从一个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革命党”变成了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对立的所谓“工业党”、“农业党”,所谓的“全民党”。事实非常清楚,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要放弃了革命性,放弃了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一基本立足点,那就要被广大人民群众所“革命”,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抛弃。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权贵的压迫总是不满的,总是要反抗和革命的,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唯一的选择就是保持革命本色,站在人民群众立场上考虑问题。

四、中共领导人正倾注全力维护自己的革命本色

与苏共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强调要实现角色转换,增强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则不丢掉革命精神,保持着自己的政治属性。尽管在中国不时地出现要中国共产党改变自己的政治属性的杂音,尽管有些人力图使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的正常讨论演变为改变中国共产党革命本色的舆论准备,但中共领导人头脑始终十分清醒,他们在坚持以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致力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围绕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总目标,进行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执政党,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党,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建设党”。这就是为什么苏共不但失去执政地位,连党组织本身也消亡,而中共在中国则产生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奥秘之所在。

(一)邓小平论搞经济建设、进行改革也是革命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发展时期。新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那么,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是意味着要告别革命,还是意味着新的革命的开始?请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引路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邓小平早在 1978 年 10 月 11 日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带领中国人民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0]135-136}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地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从而认为“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也是“革命”。

邓小平在同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10]152} 邓小平在这里不但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革命,而且指出了这场革命的“深刻性”和“伟大性”。

邓小平在 1980 年 4 月 1 日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这样说道:“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10]311}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发展生产力也是革命,不能仅仅把夺取政权、搞阶级斗争理解成是革命,实际上搞建设,实现现代化是更重要的革命。

邓小平 1984 年 10 月 10 日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21]82} 邓小平在这里强调必须把改革视为革命,尽管是与“文化大革命”不一样的“革命”。

邓小平 1985 年 3 月 28 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也这样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21]113} 邓小平在这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深刻地阐述了两次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邓小平 1985 年 9 月 23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21]142} 邓小平在这里阐述了改革之所以能带来“革命性”的缘由，实际上也阐述了改革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是“革命”的缘由。

邓小平在 1992 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21]370} 邓小平在这里指出推翻三座大山这样的革命解放了生产力是毫无疑问的，而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施改革，同样也能解放生产力，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说，两者都解放了生产力，都是“革命”。

邓小平的所有这些论述清楚地告诉我们，仅仅把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夺取政权的斗争看做是革命是不正确的。同样，只是把通过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看作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完成也是不妥当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从事建设，发展生产力，为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也是革命，是过去的革命的继续。^[22]

邓小平的这一关于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实施改革也是革命的思想，被改革开放后中共历任领导所接受，中共自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代表大会和其他重要会议的文件都体现了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思想。这里仅以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例：

该《决议》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还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社会生产力不足发展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

该《决议》还指出，这种革命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因此，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22]

（二）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方位地维护党的革命本色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努力实现角色转换，提高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的同时，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全面治党”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战略的“四个全面”之一。“全面治党”的宗旨就是维护执政党的革命本色，保持执政党的革命精神。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维护党的革命本色所展开的工作是全方位的，这里我们且列举若干方面：

其一，引导党员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维护其基本纲领的革命性。

如前所述，判断一个号称是共产党的政党是不是还具有革命的政治属性，是不是还是名副其实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主要看其有没有放弃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纲领，看其是不是还坚持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理想，看其是不是还把作为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的马克思主义视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我们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率领全国人民努力取得“接力赛”中当代人这一棒的优异成绩之际，特别强调要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习近平总书记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不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说道：“坚定

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他还形象地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强调“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3]在著名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特别论述了“远大理想”与“现实目标”之间的关系，强调在为现实的目标而努力之时，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命脉和灵魂”，“革命的理想”还是“高于天”，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要“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24]习近平明确地说道：“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25]我们要深刻理解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阶段何以特别强调坚持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深刻用意，这是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色，使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也永葆革命青春的关键一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使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要做好这唯一的执政党，唯有必须以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所独有的鲜明的党性，即革命性自信地站在人民的面前。革命性是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基。

其二，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不断纯洁自己的革命队伍。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要维护自己的革命本色，就必须使自己的队伍尽可能地纯洁，这就需要不断地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自己的革命队伍的纯洁，是维护革命本色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看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向腐败分子动真格，其反腐力度之大，声势和影响力之强前所未有的。中共实施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产生了显著的成效，这就是：确保了自己的队伍纯洁性，与此相应，维护了自己的革命本色。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6]习近平以战略思维来看待反腐败问题。所谓“战略思维”就是把反腐败问题提到确保党的革命本色，涉及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他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气解决。”^[27]习近平在这里把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视为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影响党的革命属性的最大的祸根。历史上有多少王朝和统治者没有跳出“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这一“历史周期律”。实践反复证明，革命的共产党人对于这一所谓的“历史周期律”没有天生的免疫力，它执政后同样面对权力的腐蚀。要使自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维护自己的革命本色，维护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坚持不懈地防止和克服腐败。^[28]当我们真正明确了反腐败对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意义以后，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在反腐败问题上强调“不管涉及谁，都要查到底，决不姑息”^{[29]135}，强调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这种反腐的坚定性是与维护党的革命本色的坚定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三，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强化人民性来强化革命性。

判断某个共产党是否还保持着革命的本色，说到底还是看其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即它是否还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的革命本色集中体现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上。我们也看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着深厚的人民情结、为民情怀。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色建立在忠实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一根基上。请看习近平是如何强调以人民为主体，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重要性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29]70}“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29]339}“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29]70}“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9]307}“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和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9]309}“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30]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2012年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主持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习近平强调,这八项规定是一个切入口和动员令,落实八项规定,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我们永远在路上。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从2013年6月开始,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4年10月8日召开总结大会,宣布活动初步达到了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目的。^[26]中共十八大提出了建设“三型政党”,即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的党的建设的目标,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这一目标落到实处。习近平系统地阐述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建设服务型政党实际上回答了无产阶级政党究竟干什么——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期盼,怎么干——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问题。^[31]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把建设“服务型”政党作为实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大举措。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属性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其无私性,即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私利。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无私性”,同时也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本色。

其四,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制度上确保党的革命本色。

维护党的革命本色显然仅仅在理念层面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一系列制度、法规加以保证。可以说,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设是确保执政党本色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32]对此,习近平曾经深刻地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33]基于这一认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从严治党的主要手段,也是作为维护党的革命本色的中心环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把“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34]习近平曾经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形象比喻,这就是说,只有用制度来约束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才能确保党不会走向背叛人民、背叛革命的邪道。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制度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2013年5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这两个文件传递了“依法治党”的新信息、新思维,在用制度治党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2014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这是把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拓展到了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化。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对改进党的作风进行了新的部署,其中有健全领导干部带头改进作风、深入基层调研机制;改革政绩考核机制;改革会议公文制度;健全严格的财务制度;完善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35]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党章是党的最根本的法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全体党员必须按照党章行事。习近平就多次指出:“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严明政治纪律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29]¹³²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规,全党必须一体严格遵行。”^[36]纵观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所有这些举措,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宗旨,这就是:保证权力科学配置、规范运行,正确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确保执政党维护革命的本色。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 刘少奇选集(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412-413.
- [3]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0.
-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
- [5] 刘少奇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3.
- [6] 王贵秀.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政治成长中的地位转变与角色转换[J]. 中共中央学校学报,2008,12(4):24-29.
-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贾小明.“执政党”概念源流考——兼论毛泽东的“革命党”思维[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5):108-112.
- [9] 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3.
-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1] 侯琦.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问题观点综述[J]. 党政干部学刊,2003(2):20-21.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1.
- [13] 石冀平. 执政党与革命党之辨[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4):118-127.
- [14] 金安平. 中国政治语境下的政党概念[J]. 政治学研究,2004(4):33-40.
- [15] 波诺马廖夫主编. 苏联共产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16] 陈学明,黄力之,吴新文. 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疑问[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 [17]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M]. 北京:求是出版社,1982:201.
- [18] 齐向,等,编著. 苏联解体内幕[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 [19] 波诺马廖夫,主编. 苏联共产党历史(下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827.
- [20] 刘建强. 党的性质与“两个先锋队”思想——兼评苏共亡党的教训[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6):49-51,+70.
-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2] 雷云. 不能把革命与建设截然分开——关于“革命党”、“建设党”提法的商榷[J]. 科学社会主义,2003(2):50-53.
- [23] 习近平. 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 [24]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 人民日报,2013-08-21(1).
- [25] 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N]. 人民日报,2013-01-06(1).
- [26] 张书林. 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基础、架构和特点[J]. 理论探索,2015(2):22-26.
- [27]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 人民日报,2012-11-16(4).
- [28] 姚桓.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习近平执政党建设讲话的中心思想[J]. 学习与探索,2014(5):5-8.
- [29] 十八大以来的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0] 习近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的工作[J]. 求是,2013(1):3-7.
- [31] 蒋仁勇. 党的建设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三型”政党讲话的精神[J].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14(4):46-50.
- [32] 杨凤城. 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谈[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6):93-96.
- [33]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 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N]. 人民日报,2014-10-09(1).
- [3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 求是,2013(22):3-18.
- [35] 戴立新. 习近平管党治党新思想研究[J]. 探索,2014(6):36-39,+55.
- [36]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4-10-29(1-4).

责任编辑 刘荣军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